

人文
学术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严绍璁 著

比较文学与 文化“变异体”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Variant”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严绍盪 著

比较文学与 文化“变异体”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Varian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严绍璦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6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7100-9

I. 比… II. 严…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东亚②文化史-研究-东亚
IV. ①I310.06②K31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233 号

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

严绍璦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赖英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5 字数 324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100-9/I·535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自序：我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历程

谢天振、陈思和与宋炳辉三位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旨在集合 30 余年来我国学界人士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表述的多彩智慧，展现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实践与经验，既可为国人继续推进这一学术提供参考和提示，从而或许多少可以削弱一些在这个领域中“言必称希腊”的“无主体”状态；又可为中国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对话建立起较成规模的研讨平台，展示“中国话语”的力量。此于人文学界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2009 年初春，文库主编之一宋炳辉先生来京告诉我这件事情，感到很是振奋。炳辉告诉我，规划中邀约的单子上也列有我的文稿，则又感到受宠若惊。这倒不是故作虚伪，实在是我自己感到，在我 50 年的人文学术生涯中，特别是 30 余年来逐步走进“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我的学术基础、学术起步与学术实践，与我们比较文学学术研究领域中大多数学者的状态，殊不一致。自己数十年来依凭兴趣，经常在几个“学科”的层面中融合操作。知我者誉我“融通”，不知我者责我“越界”。炳辉兄至诚感人，热情可掬，他转达思和、天振二兄盛邀之情，又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这样的知名学术机构刊出，我就被鼓励和被诱感到这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中来了。

综观世界华人学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路径，大致有两种历程状态较为普遍。一种是在国别文化（中国的或世界各国）的研究中，逐步接受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理，于是在不同的学术层次和层面中跃起而进入“跨文化立场”的“比较文学”研究；一种是在尚未形成自己的国别文化研究本位时，已经先行接受了“比较文学”的学理，直接进入这一领域。上述两大营垒虽然出发点不一，但几乎都是在学术的行程中受到欧美“比较文学”基本学理的洗礼而一步跃入这一“学术殿堂”的。我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行程，显得非常异类。直到现在使自己忐忑不安的是，因为至今我还没有接受过学

界普遍认定的那种“纯正学理”的洗礼,却已经在这个神圣的祭坛上做起了弥撒,尽管当下学界有朋友对我在30余年间以“文本解析”为基础而积累的关于“跨文化研究”的实践和经验,以“文化变异体”为核心提出的“文本发生学”论说,给予了不少的美誉,但也有些先生和朋友对我在学界的“身份”(假如有这样的“身份”标识的话)持有异见,没有一定之规。

(一)

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北京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读书,用今天学界最时髦的话来说,受到的是很经典的“国学”教育,然而自己在一生的学术道路中却在不知不觉跌跌撞撞间竟然走到了被学术界称为“最前沿学科”的“比较文学领域”中了(假定自己走的这条道还叫做“学术”的话),不禁感慨良多。

回想50多年来自己的历程,不知是天性的使然,还是先辈的教导,或许二者兼而有之,自己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在最基础层面上接受最基础的“国学”教育的时候,常常有些“躁动不安”的质疑,例如我常常捉摸我们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总体进程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时候又捉摸当时提倡的所谓“古为今用”究竟应该怎么个用法?自己的这些质疑埋在心底,却总想知道其所以然。学生时代依据“教学大纲”读到的书本,从《周易》、《尚书》到儒学宗师孔老先生等诸子百家,由此延续数千年一直到浩如烟海的《皇清经解》,都是中国人编著的给中国人读的书;为我们讲授课程的前辈,皆是学界名师,当代在各种“论坛”上那些花里胡哨张扬妄说的“专家学者”岂能望其项背!像游国恩、林庚、冯钟芸、吴组缃诸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张政琅、田余庆、邓广铭诸先生讲授“中国史”,张岱年、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和“史科学”,顾颉刚先生讲授“中国经学史”,魏建功先生讲授“文字音韵训诂学”,王重民先生讲授《目录版本校勘学》,王力、吉常宏先生讲授《古代汉语》,林涛、朱德熙先生讲授《现代汉语》,以及由郭沫若、吴晗、齐燕铭、侯仁之、席泽忠、向达、史树青、启功、阴法鲁诸先生组成的巨大阵容连续两年讲授《中国文化史》。他们皆是经纶满腹的天下名士。我等听诸位先生的讲授,趣味丛生,自己考试竟然门门得了“五分”。尽管“学术氛围”很是浓重,但诸位导师讲授的却还只是在中国范围内的关于中国古文化

的学识,自己心里的质疑时时作祟,挥之不去。时间稍长一些,与诸先生在“私下”的聊天中却似乎又慢慢明白了许多,原来诸位先辈导师在当时课堂上依照“教学大纲”的讲授与他们本身所具备的知识量其实是不相等的,他们满腹经纶好像只透露了一半似的,例如,专业主任魏建功先生与我们“聊天”,说他 20 年代在北大当学生,先师钱玄同使用的是瑞典学者高本汉(B. Karlgren)构拟的《切韵音系》作为教本来讲授“汉语声韵学”的。魏先生是被学术界定评为“架起了从传统的音韵学研究通向近代音韵学研究的桥梁”,他作为近代汉语音韵学的奠基者的学识表述以《古音系研究》为主要的代表。我受好奇心驱使,于是找来此书阅读,想一明究竟,翻阅后则使我大受震动^①。先生在大著中明确说,“这十年中的情况(指上世纪 20—30 年代),我们音韵学的新建设现在才算有一点萌芽。想当初,十年前我听钱玄同先生讲的时候,他就拿高本汉的著作作为教材,同时说明他自己的主张”。我读到此段,便一时兴发查查“高本汉”的业绩如何,才知道原来他是 20 世纪初欧洲杰出的中国学家,擅长于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使我更加震惊的事是,高本汉 1889 年出生,当时还是个不算年老的学人,但是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有卓著名望的骁将之一钱玄同先生,虽然年龄比高本汉还大两岁,却拿小弟的著作作为教本,可见前辈不居高视下,积极寻求新学问的气度。钱先生不仅把欧洲人关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引入自己的学问中,并且引导他的学生建立“中国文化的新视野”。再读魏先生的书,先生在自己的论说中对于极为丰厚的汉语语料的“声韵学”阐述,除了以自我的思辨提纯我国传统的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之外,还遵循他导师的轨迹,高度重视欧洲由沙畹(E. 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等在《通报》上发表的有关“Sinology”的相关阐释,特别是由伯希和与马伯乐(H. Maspero)所做的关于汉语古音的构成,并且追踪由爱约瑟(J. Edkins)、赛莱凯尔(F. Schlegel)、武尔皮奇利(Z. Volpicelli)、桑克(S. H. Schaank)和伏尔克(A. Forke)等学者提出的主张。原来被我们这等学生视为非常枯燥和闭关的“汉语音韵学”,在欧洲学界竟然有这么多的学者关心,并且创造出如此热闹的世界;而被人指责为“封建

^①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北京大学出版组刊,1996 年中华书局重版,2001 年收入《魏建功文集》第 1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余孽”的魏建功先生,竟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具有如此宽阔的学术视野,真是为我等后人打开了一个偌大的视窗^①。恰好当时,我用一学期的时间,修完了北大规定的两年半的英语,魏先生就对我说,“你再去读点日文吧,日本人搞了我们很多东西,将来总归要有人来清理的”^②。于是,我就边上日文课,边阅读一些日文的“中国学”的著作,记得上《史记》课的时候,我就尝试翻译日本学者撰著的《司马迁生卒年考》,感觉到其对中国学术的表述真的还有一种新天地。于是便寻思这个“Sinology”或许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与世界连接的一种“通道”吧?

一个人一生中的道路在冥冥之中或许可能真的与“机运”有着一些联系的。1964 年由于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先生在与学界数位大先生协商后,希望把由 1948 年被我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北京的过程中在京西美国燕京大学封存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构”即“燕京—哈佛学社”的档案进行拆封登录,“看看有哪些对我们文化建设还是有用的”,他要求北大安排一两个年轻助教,乘着原来的中方老人还在,让他们做些指导,好好地做起来。经过北大谨慎研讨,出身“黑类”的严绍璁被留校作为助教从事此项工作。现在想来,齐燕铭先生作为国家高级领导成员,大概是想对“燕京—哈佛学社”实施“解禁”,似乎希望以此为一个突破口,拓展中国文化研究的世界性眼光。但是,这个工作我实际上只做了不到两个月,齐先生就被毛泽东主席指定为

① 魏建功先生(1901—1980),江苏人氏,1919 年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1921 年入北大中国文学系,师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1926 年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教师,自助教至教授。1935 年刊出《古音系研究》,1946 年受国民政府委派,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在台湾建立“国语电台”,创办《国语日报》,在公务系统、教育系统等行业中禁止日本语,推行国语,其功绩彪炳千古。同年出任新建立的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第一任主任。1948 年末回大陆,于 1949 年 3 月出任解放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第一任主任,1951 年出任“新华辞书社”社长,主编《新华词典》。1956 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首届学部委员(院士),1959 年受高等教育部委派在北京大学筹建中国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出任专业主任,1962 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详见严绍璁等编辑的《魏建功文选·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对中文系学生强调外语外文教育是北大“人文学术”的一贯的传统。记得 1971 年 7 月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在北大未名湖边碰到了老系主任杨晦先生,他当时还是未被摘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向我打听了一些情况后,突然问我:“你那个日文丢了没有?英文也不要丢,别看现在没有用,外文这个东西,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的!”杨先生瘦小的身躯中燃烧的是对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是对一个青年教师未来成长的希望。一个中文系的主任,在艰难的时刻,教导他的学生不要丢掉外文的学习,因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眼光!我就是被他们领上学术之路的众人之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他规划的人文学术在一个角落里的整顿、重组和复兴被阻断了。但对于我来说，齐先生虽然不幸被监禁，但“Sinology”这个概念，却与我学生时代的朦胧的感觉相契合，由此在我心中播下了努力探索“中国文化”与“世界连接”的学术性“种子”，开辟了一生的道路。

(二)

当我稍稍深入到日本中国学的内涵的时候，逐步感知到所谓“国际中国学”的研究情况原来是非常诡谲和复杂的。就说近代日本东京大学的“儒学研究”吧，20 世纪初期两位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井上哲次郎(1855—1944)和白鸟库吉(1865—1942)作为这一特定时空最杰出的学者，便在“儒学”的表述中具有完全对立的观念。井上哲次郎自 1891 年以阐释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作为进入“儒学阐释”的起步，倡导以近代语义阐释儒学，他把儒学的核心“孝悌忠信”诠释为“爱国主义”，构建成为近代日本国民的基本道德纲目，由此而开创了日本的“国家主义儒学观”。白鸟库吉则以 1909 年发表《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为起点，介入“儒学阐释”，在日本文化思想史上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白鸟把孔子创导的“尧舜禹”三王政治指称为“物神崇拜”的产物，完全由虚构组成，提出了中国历史是“叠层累加”而造成，由此引导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先秦文献提出了近乎全面否定的质疑，构成“激进批判主义儒学观”。两种主流“儒学观”的对立，引起后世研究者诸多的困惑。

若从本质层面上考量日本的“国家主义儒学观”和“激进批判主义儒学观”的研究，他们与中国学者虽然面对着共同的“客体”，然其表述的本质其实并不在一个学术框架之中，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国人研究“国学”的自然延伸。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视野再作若干扩展，文化状态的表现也许会更加生动和深刻。18 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如勒奈·笛卡儿(René Descartes)、莱布尼茨(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克里斯琴·乌尔夫(Christian Wolff)、法兰西斯·魁奈(François Quesnay)、马里·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 即伏尔泰, Voltaire)和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等等对华夏文化的“研究”，他们几乎都以阐发中国儒学“非神信仰”的“理性道德”为核心，并提纯为他们反对中世纪欧洲“神学统治”、创建近代

“理性社会”的思想材料；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东亚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思想家，例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了庵桂悟、中江藤树等等的著作，也都是在儒学的道德层面展开论述，然其兴奋点却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迥异，他们强调例如“阶位制”的伦理学意义、“忠诚信念”的社会价值、以“神儒习合”作为文化本位的排他主义，以及“以心读心”的“格物致知”，等等，他们甚至把中国“儒学”中的所谓“理”或“心”的范畴，强调为“日本古已信仰的‘神本体’的外化形态”。这样的“儒学阐述”成为德川幕府政权强化自我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因而在19世纪中期发生的明治维新的最初30年间，又成为日本维新思想家推进近代型“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这个作为日本近代维新思想革命的对象，在20世纪初期却又有了新的形象，“日本儒学史”上举办第一届“祭孔大典”的人士竟然是日本的军方，其倡导者又竟然是甲午战争的“黄海元凶”。1906年以日本陆军元帅、海军大将伊东佑亨与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为首，在东京北部的足利学校纠集了20余位日本将军，举行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祭孔典礼”，目的是将“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告慰孔子。这位伊东元帅1895年曾担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在中国威海卫附近的丰岛冲打响了近代史上日本进攻中国的第一枪；这位东乡大将当时担任日本主力舰“浪速号”舰长，他指挥击沉了清朝北洋海军主力“高升号”。由他们开始的“祭孔典礼”不久即被由日本研究儒学的文人组成的“斯文会”接手，一直到1943年在美军轰炸中停止。依附于此种“皇国主义”本体的学者在“理论”上阐述了军国主义的对华战争是“把真正的儒学送回中国是日本国民神圣的责任”的价值意义。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孔子”作为自己的战旗，发动了对孔子祖国的进攻，这种想来一定使孔子“莫名惊诧”的文化事态究竟缘何而能发生呢？

在同样的时间段中研究中国儒学，欧亚两地的阐述竟然是这样不同；同样在日本的近代进程中，前后40年间孔子的价值又竟然会如此“自我对立”，中国学术史上至今还无人探讨过此种“文化怪相”。我在逐步的思考与摸索中开始明白，“国际中国学”研究表述的多元价值，经常与我们“国学国人”对同一主体的理解出现的差异相关，这种文化状态与研究的客体对象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差异是由于研究者“文化出身”与“文化身份”不同，从而在各自研究中隐含的“哲学本体”不同而造成的，而各种“哲学本体”则来源于生成

这些研究的“母体文化”之中。正是研究者自持的“母体哲学”决定了研究者(当事者)对于中国文化(例如“儒学”)作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和阐述,也只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解与阐释,才使得多元研究在各自的“母体文化”中具有相应的生命活力——或许这就是“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形态。因此,如果要真正把握“国际中国学”的表述,理解它们的价值,仅仅依赖于自己的“国学”根基显然就是不够的了;至于期望外国人的研究能够与国人的观念想法契合,那就更加天真了!作为一个认真的学者,就必须在相当的层面中把握与理解养成他们各自的“中国文化观”的“母体文化”,从而在“国际中国学”研究中使自己具备“对象国文化”的基本素养,能够把握论说的本质,这就成为介入这一学术层面的必由之路了^①。

(三)

或许正是这样的认知,无形的学术的推力把我自己的学术进程又推进到第三个层面中,即从基本的“国学”教育经由“国际中国学”的通途而试图进入“对象国文化”的养成研究中。世界文化的广阔丰厚使自己只能把这种“养成”放置于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我的能力远远达不到学界有些先生的文化高度,他们可以做“环球世界文化研究”,我虽然对此心存羡慕,但掂量自己实在是没有本钱来做这样的学问,于是,便把“养成”目标集中在中国的邻居“日本”的身上。在学术界主张“国际化”、“世界化”的浪潮中,我想我们如果连自己邻居的文化构成也没有摸清楚,就言必称希腊,时间长了恐怕就会延误了“国际化”。至于说到“日本”这个课题,国人又有极为复杂的情感形态,不仅是学术界,似乎社会人士只要有人说到“日本”,就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它的“被表述”表现为高度的“泛化”。但依我30多年来对日本的透视,觉得我们对日本文化的哲学本体、内在构成、运行机制等等层面的把握,可能是世界上至今还不能把握到位的数种重要的文化之一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状态,在“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领域中,所谓的研究报告,大量的其实是拘泥于“形态描摹”而常常掐不到本体的咽喉。

^① 基于对“Sinology”内含本质的这样的理解,我逐步地认为,这一学术实际上是“跨文化研究”总体学术中的一个层面,因此,我把“关于‘Sinology’(中国学或汉学)的属性与范畴的思考”列为本书第三编。

在进入“日本文化”养成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前沿的挑战不只是国人认知的泛化,而且也来自日本文化研究中被深深嵌入的以“国粹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孤独情绪”。自中世纪以来,日本一部分贵族分子把其民族原始的“多神信仰”引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阐释与强化了“日本为神国”的观念,把“日本文化”解释为“纯粹的日本产品”,强调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才能享受,制造了“日本文化”是一种“高纯粹”的“日本民族奢侈品”的幻觉,遮蔽了其“文化内在构成本相”。他们试图紧握对“日本文化”阐述的话语权力,从而把对“日本文化”的诠释引向脱离“世界文明总体语境”的“孤立主义”与“绝对主义”,这种价值观念蔓延至今,并在当代日本学术界相当层面中仍然以“非常近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海洋的日本文明论”,便把“日本文化”与“日本文明”发展历史,阐释为与“亚洲大陆文化”的“分离与对抗”的历史,以表现“日本文化”的“独特的优越性”,其中就深含着极为顽固的关于“日本文化发生”的“绝对主义”和“孤立主义”精神倾向^①。这样的文化思潮,不仅长期误导了日本国民,而且对中国从事“日本学”研究的一些学者来说,往往会在缺乏科学的文化理论的状态中,误以为真,也拿来作为自己的“日本文化观”,从而遮蔽了中国人把握日本文化的智慧。

在近30年前,一个中国学者要表达自己真正独立的见解有时候并不容易。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我读到了日本文学史家西乡信纲的关于“日本文学与华夏文明的关系”的论述,他把这种关系表述为“学木乃伊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我深不以为然,撰写了《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一文,并致函北京大学《国外文学》编辑部^②。编辑部同仁很高兴,说这是《国外文学》创刊以来收到的第一篇批评日本学者论说的文稿,言之成理,即可刊用。然而,不到一个月,他们又紧急给我送来书面通知,曰,“绍盩同志,本刊顾问审读了你的来稿,他不同意你的论说,本刊不能发表了,日前

① 关于这一主题,可参见拙文《解析“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的本质》,载香港大学现代文化学院主编:《Multiculturalism and Japanese Studies in Asia and Oceania》,2009年12月;《日本古代文明的历史考察——与“海洋的日本文明论”史观的商讨》,载《思考:中国与日本的三个视点——环境、共生、新人文主义》,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对“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的思考》,载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迎接亚洲发展的新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西乡信纲文见《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与创造》,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此书原版系日本东京厚文社1954年版。

编辑部曾做承诺,谨致深深歉意”。我一时彷徨,编辑部提议我直接向顾问权威请教,看看是否有挽回的余地。于是,我就壮胆拜谒了顾问先生,先辈也很直爽,他问我:“你知道西乡信纲是谁吗?”我说:“不知道。”顾问说:“他是日本文学研究的权威,你现在指名道姓地批评他,日本人会以为中国是不是又要发动对日本文化的‘大批判’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似乎触犯了什么“行规”,但我对权威的“逻辑”又有点茫然,当时我只是北大芸芸众生中一个普通的“讲师”,怎么会有能力发动对日本文化的“大批判”呢?正在不知所解的时候,先辈又说了一句有些奇诡的评语,他说,“你在文章中佐证的材料很多,你在哪里弄到这么多的材料的?有些文献我们还不大会知道哩,倒是驳不倒,可以说你材料很多,但你点名批评西乡是不对的!”后来,虽然在编辑部诸先生的斡旋之下,我改成只批评观点不指名道姓,此文才刊登在北大《国外文学》1980年第2辑上^①。论文虽然被公刊了,但这一小小事件却提示我,在理解、把握与阐述日本文化与日本文学“本相”的学术进程中,年轻学人面对国内“权威”追随日本国粹主义的桎梏造成的局面可能是很严峻的;但同时在不经意中我还获得了另一个感悟,即尽管这种局面严峻,但权威们毕竟是学者,他们在最基本的层面中,还是能够感悟到确切真实的基本材料所表现的力量,即人文学术必须用“事实说话”。几乎整个80—90年代的20年间,我就在“日本中国学”、“日本文化与文学”以及“日本藏汉籍”几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中学习与探索,走自己的路。

(四)

正当我在自我养成日本文化认知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季羨林、乐黛云诸先生都满怀热情地把我的学术兴趣以及由此发表的文稿称为“这就是比较文学!”不仅使我受宠若惊,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学术情趣。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比较文学”学科刚刚在复兴的萌芽中时,我作为“中国古文献专业”的年轻教师已经对它萌生了兴趣,我觉得这个学

^① 尽管30年前的这一次现场的“博弈”是十分残酷的,但自己一直在心里愧疚的是自己未能摆脱“体制”评价的诱惑和压力而作出让步。眼下自己在某些层面上也可以对他人研究的“生死”起某种作用的时候,我总是告诫自己要反省30年前的这一“现场”,在学术领域中,坚持以追求真理为上,以表述实事实本为上,以多元共存为上。

科的主张,与我正在研讨的“Sinology”似乎有相似和相同之处,但又感觉它作为一门“外国学问”,自己只能仰之弥高。1980年追随乐先生编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提供了三篇日本学者论文的翻译稿,乐先生去美国哈佛大学等访学3年,我就协助做些《论集》的出版事务。或许因为这个原因,1982年《读书》编辑部邀约我参加了由他们主持的6月28日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朱光潜、黄药眠、李健吾、周珏良、陈冰夷、杨周翰、李赋宁、季羨林八位学科耆宿,还有温儒敏、张隆溪和我三个后辈。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学界这么重量级的学术聚会,深为感动。据说,这次聚会竟然成为上述“八老”最后的共同见面,《读书》真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为中国比较文学史留下了重彩的一笔。我在这个聚会上受先生们的鼓舞,怀着对这个学科的憧憬和热情,也大胆地说了些自己的感想,提出要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大概是我对中国未来这一学术发展的最原初的思索吧。现在想来老先生们大概会有“这个后生小子胆大妄为”的感觉。我后来想到这个发言,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起码的实践和体验,竟然构想起“学派”来了,确实有些“混账”的状态,但激情倒也是真实的。由此我就觉得我与“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是“同声相求”的了。这一发言的内容承蒙本书主编允诺,现在就编为本书第一编的首篇,可以作为我在精神层面真正思索“比较文学学术”的起步性标志。

“比较文学研究”与一切“国别(或民族)文学研究”虽然都被称之为“文学研究”,但它们的“介入点位”却全然不同——“比较文学研究”面对的是以丰富的多样性特征共存于世界的“文学”,与“单一国家(单一民族)的文学”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样一种存在巨大差异的大尺度文学格局中,研究者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超越“国别文学研究”的观念、视角和方法进入自己预设的对象中进行运作从而提升对人类智慧的把握、理解和表述,便成为我经常的思虑。“比较文学原理”的著作都把比较文学学术划分为“比较诗学”和“关系研究”两大层面,这样的框架思维似乎已经成为“经典型”的学科构架。但我在逐步的行进中,慢慢地对此产生了一些惆怅,总有些迷茫之感。一个困惑是尽管我把“比较诗学”作为这一学术的“灵魂”敬奉,却又不明白它的存在是否如同“人”的“灵魂”依附于人体那样具有“物质型”的基础本源?另一个困惑是在“文学关系”研究中当我们致力于揭示一种文学内在具有的

“异质文化”的元素时,其“价值意义”究竟有没有预设的“终极目标”?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在这个学科中自己就常常既有兴奋,又要不断地“反省”、“挣扎”和“摸索”。

我自己在对“比较文学”原理基本无知的状态中不经意地把研究场面转移到了这一学科中,茫然中,我在青年时代受到的关于中国文献学的基本训练和在中国特殊的“文化革命”10年中获得的基本教训却在冥冥中发生着助推作用。前者就是相信人文学术研究一定要“回归文本”,把握住“文本”就是在学术的海洋中抱住了“救生柱”,就不会沉没;后者就是人文学术研究必须恪守这一学术的基本的“学术规范”,保持学术跃动中的“心定气静”,不要把自己的学术兴趣被自己也闹不明白的一些时髦的鼓噪所诱惑。30年后回顾学术的踪迹,可以说自己也还算得上在进程中“守贞求真”了。

前述的《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论文,开启了我自己对日本文学与文化的“构成本相”的探寻与阐述。当我开始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含文学)作为解析的“文本”而把它放置于学术的解剖台上的时候,逐渐地意会到它的内部组成的“多元复合”,我的眼前于是展现了“文学文本”内部构成的瑰丽的世界^①。无论是作为这个文化源头的“神话体系”,还是由此而发展形成的“散文叙事”和“韵文咏唱”,以及由这样的基本文学部类中不断生成的多样文学作品形式,其内部构成几乎都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成分”而显得并不那样“纯粹”了。其实,一个中国学者,只要具备“国学”的基本训练、具备若干世界文化知识和近代文化学观念,三者综合在一起的话,他总可以从日本古代文化中体验出隐藏在它的整体形态内的亚洲大陆文化的元素,例如从作为日本文化源头的“记纪神话”中便可以解析出诸如佛教的、华夏的、朝鲜半岛的、通古斯的,甚至是阿依努的“文化元素”,至于近代日本文化,除了上述这些成分之外,当然还可以解析出欧洲、美洲和更

^① 依我的见解,日本列岛自古以来事实上先后存在过两大族群。在我国从《山海经》开始到公元四五世纪时代典籍中记载的“倭”、“倭奴”、“毛人”、“虾夷”等实际上是一个被称为“阿伊努/AINU”的族群,他们是日本列岛已知的“原住民”(Proto-Japanese)。现在被称为“大和”民族(YAMATO)的日本人群,大约是由公元前4世纪左右开始居住在亚洲东部(含华夏族与朝鲜半岛人群的先祖)、亚洲北部乌拉尔山脉之东信仰萨满教的通古斯人群、太平洋诸岛屿上北漂的人群共同组合成的“新人种”族群。1992年我参与了日本北海道白老地区“阿伊努人生态”的调查,更加确信了这样的认识。本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文化”是“大和族的文化”。拙著《中国文化在日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日本的发现》对这一命题有较为详细的阐发。

多的“非日本文化元素”，即便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誉为“最典型地表现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的日本“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创作也不例外^①。每一次在对文本的阅读中感悟到它可能存在的内部形态时，便会产生有点像侦探者接近“本相”的愉悦。我自己以“跨文化视野”观察到的这些内含多元文化元素的“新文本”，它们都具有从“原发性文明”的承传中脱出，在“特定时空”中与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多形态文明在不同的层面上组合成的各种“新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这表明“文学文本”的建构，它们是一直处在“混溶性动态”之中的，“静止的文化”只是相对的。我在思索中徘徊，在徘徊中思索，反复再三，终于借用生命科学范畴内的概念，把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构成的“文学文本”称之为“变异体”(variants)。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发表了 my 论文《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的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文可以看成是我构建这个概念的起步。在乐黛云先生的支持下，1987年，作为研究论述的阶段性的总结，出版了我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与普遍的《日本文学史》与《东方文学史》的表述不同，我不仅仅在“日本文化”中认知“日本文化”，从一开始我就把“日本文化”放置于我的知识量能够达到的“跨日本文化”的多元文化氛围中考察，自然就得到了与许多研究者不一样的体验和认知。

1994年11月7日，日本方面为纪念“京都建都1200周年”，明仁天皇在京都都会见了6位外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家”，每人对话7分钟，我侧位其间。这是在1500余年间中日两国文化关系史上日本天皇第一次与中国大学教授进行直接对话，天皇说：“先生研究日本文化，请问主要阅读哪些著作？”我回答道：“要读的书很多，但我最有兴趣的是像《古事记》、《万叶集》这样的日本文化的经典的文本。”天皇说：“这些书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阅读也是很艰难的，先生阅读时感觉怎么样？”我说：“作为构成日本文化与文学的最具有经典意义的文本，每次的阅读都感觉到进入了一个充满美意识的世界。它们的古老和丰厚，造成了我们阅读中的困难。但是，《古事记》、《万叶集》不仅是以日本本土文化而且是以东亚文化，其中包括中华文

^① 关于“记纪神话”中内含的多元文化成分的解析，可参见拙著《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日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川端康成文学内含多元文化成分的解析，可参见我为周阅的《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所作的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